

语用学综观论：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应用

蒋红柳

摘要：话语分析在对话句或语篇的研究中，以分析具体交际语境中语句的真实语义为主要目的。语用学综观论主张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范畴，围绕语言的可变性、协商性和适应性来观察研究语言的使用与选择。话语分析与语用学在探讨具体语境中的言语使用、话语意义传递等涉及言语交际互动领域多有交叉并有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分析言语使用时如能从这两个研究领域出发综合运用，可对所考察的话语有更加全面的解读。而以语用学综观的语言使用“三特性”来分析交际语境中的话语选择与表达，经由语用学综观的研究路径达至话语活动的微观分析解释层面，可以对话语样本做出可信的分析解释，为话语分析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解释工具。

关键词：话语分析；语用学综观论；语言使用；交际语境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18) 02-0122-09

话语分析以语句(utterance)作为分析对象，“把言语视为语言的具体运用单位，在语境中分析语句的意义，这种分析常常是超出句子的平面进行的，语言的素材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①同时话语分析还探讨句子如何连接成为语句，以及语句间的衔接关系和意义连贯等问题。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话语包括三个方面：语言使用、思想传递和社会情景中的交际。^②同样，从宏观语用角度，我们确信“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对客观世界的现实有一种深刻的对应关系”。^③这种对应关系反映在话语交际中，便是人们在日常言语活动中语言使用的动态选择与具体交际语境的互动模式。话语分析作为研究语言使用的一门交叉学科，特别是在探究社会语境下的言语使用领域，与语用学有诸多重叠交叉部分。虽然有学者认为二者在理论从属上关系不明，也有学者希望话语分析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但笔者认为以语用学的相关理论作为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也是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除了语用学本身及它与语言学内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外，还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等边缘学科结合，甚至与其他邻近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不同学科范围内语言的理解和运用。”^④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的涵盖宏观语用理论与微观语用分析的语用学综观视角(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作为分析交际话语的理论基础和工具，透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可变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适应性(adaptability)(简称为“三特性”)，研究并解释话语表达与传递意义的语言选择和使用行为。

作者简介：蒋红柳，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都方言陈述句和疑问句边界调语音实验研究”(14YJA740015)、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一般项目“大学英语语音教学模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Skqy201343)

① G. Brown and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罗选民导读部分，第F14页。

② 参见J.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杨信彰导读部分，第F11页。

③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④ 何自然：《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中国外语》2013年第5期，第19-27页。

一、话语分析研究的语用学综观视角

（一）语用学综观论

维索尔伦在欧陆语用学派的基础上，通过区分“语言资源的语言学——模块化的语言学理论”与“语言使用的语言学——语用视角”，提出了语用学综观的主张。他认为语用学主要是探究语言使用特征及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语言选择问题，这些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由于研究语言的使用并无确定的研究对象，因此语用学不与传统语言学所划分的研究模块（学科）诸如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和语义学等相平行，语用学既不是现有普通语言学理论框架内的一个新模块，也不构成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而是为认知、社会和文化所涉及的语言使用行为提供语用学（综观）视角。^①他在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② 中指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适应性这三个特性。”^③

综观论的重心在于语言使用，即对语言进行选择。虽然这些选择并不完全相同，如一些选择可能更具有特别用意，但大多是利用对比的方式来形成不同的选项。维索尔伦强调，选择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且选择总是涉及元语用的自返性并运用检视影响等人类的认知机制。^④语言使用的可变性确定了语言选择的范围；协商性则反映了语言选择的动态、灵活特性。在可变性和协商性的基础上，最终帮助实现并达成话语交际结果的则是适应性，交际各方在特定的语境下通过相互适应对方的话语模式来寻求达成期望的交际结果。虽然适应性的基础是可变性和协商性，但维索尔伦强调这三个概念从根本上讲相互关联、不可分离。^⑤语用学综观视角便以这三个特性为基础来观察和阐释各种语言使用现象。在其2012年出版的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中，维索尔伦对语用综观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强调语用学研究的起始点应基于：“语言使用的基本活动是生成意义。而这一语言使用活动不仅包括在语言结构不同层面的连续选择，还涉及交际策略和语境。选择本身则既包含言语产出，也包含言语感知，是一个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意识的话语使用过程或活动。”^⑥

在三特性基础上，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是另一个对话语交际十分重要的因素。维索尔伦认为语用学的语言行为研究所指涉的文化维度，主要包括口语社区与文字世界、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模式以及主流环境相对于亚文化环境等之间的对比。^⑦这实际表明话语选择与社会文化语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就语用学所关注的语言形式与交际功能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显然与话语分析关注动态语境下的言语使用以探索语句的真实意义有较为一致的研究视角。维索尔伦强调，语言语用学为研究社会关系语境中外显或内隐的、连续校准的动态语义生成过程提供了所必需的研究工具。^⑧于是，语用学综观论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工具。

（二）话语模式的可变性特征

可变性是指语言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也可理解为语言因地域、文化或功能差异而具有多样性的特质。伊克特和麦康内尔-吉内特（P. Eckert & S. McConnell-Ginet）指出：“在一种语言内部也可能因不同的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而形成不同的交际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① 参见 J.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pp. 1-2, 7.

②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1999年由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出版；2000年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该版原文影印本，汉译书名为《语用学新解》；200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钱冠连、霍永寿的汉译本，书名为《语用学诠释》。本文征引主要采用外研社影印本。

③ 这三个术语在外研社版的何自然导读中分别译为：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第F15页）；钱冠连、霍永寿汉译版则译为：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而据维索尔伦对“三特性”的描述，“variability”这一概念指“语言可供选择的范围不是静止不变，而是持续地在变化”（*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59），故译为可变性似更贴切。

④ 参见 J.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1-52.

⑤ 参见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2.

⑥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51.

⑦ 参见 J.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92.

⑧ 参见 J.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19.

话语交际双方即使是说同样的语言,但在实际语言运用上仍存在差异,他们之间也会产生交际困难。”^①对此,维索尔伦也已指出,特定的规则、制度和社区均有需要遵守的专属交际规范,这些规约所形成的语言选择是现实世界里最重要的语用现象。而一旦使用语言便意味着会有意无意地基于语言内部规则(比如语言结构)和外部因素(语境)连续不断地进行选择。同时,语言使用可选择范围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持续发生变化。说话人会根据交际互动的情况实时对语言使用的选择策略进行修改,既可能在已有的会话策略中做选择,也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形成新的会话策略。^②

从话语分析的社会文化这一视角,杰伊(J. P. Gee)提出语言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二是在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内作为人类关系的基础。^③而话语分析所遵循的一般原则,是把话语看作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重视语义、上下文、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话语各个成分和层次的关联衔接。就话语分析而言,我们“不仅要了解话语的表达层,还要深入到意义和动作(action)层,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注意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的作用”。^④帕特里奇(Brian Paltridge)在言语共同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的概念。话语共同体主要以经常参加共同活动来划分,如参加同一个俱乐部、协会或同一所学校的同学等这样的人群,他们通常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观、人生目标和信仰,并在话语交际过程中因采用只属于他们群体的话语模式而达成默契。而个体通常属于多个不同的话语共同体,其话语模式会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间进行变换。^⑤如有研究表明,在不少美国大学的女生联谊会中,女大学生间在陈述句末使用高升调(HRT)的语调模式,而在女生联谊会之外就会刻意调整她们的话语策略以适应社会语境的要求。^⑥正是话语模式的可变性特征,让我们在开展具体的话语分析时,需要关注交际语境、交际方的社会文化背景、身份认知以及会话参与者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话语模式选择的影响或限制。

(三) 话语交际功能与协商性

协商性是指语言使用中的选择并非机械地严格按照某种限定条件或规则进行,也不依据“形式—功能”之固定关系,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话语策略,其特点是不确定性。说话人在会话过程中必须选择一种言说方式,但其对语码的选择则具有不确定性。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含意的甄别过程也面临不确定性,因为任何话语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码。说话人通常会根据对话方的身份、社会地位、性别、年龄以及双方的熟悉程度等社会语境,再结合交谈环境、氛围、交谈方式(面对面或电话等远距离交流)等交际语境来选择话语模式,即说话人在言说方式的选择及真实意义的表达上主要依据自身对交际过程(语境)的动态评估。了解说话人言说时的语境——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文化语境、交际双方的心理和角色关系等互动因素,对理解其话语含意至关重要。^⑦显然,语言协商性特征,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话语模式的灵活与不确定性。

维索尔伦指出,对话语的解码是一个涉及语言使用的可变性和协商性的过程,而语言使用的基本特性则是语境的意义表征状况。^⑧这里,我们就以英语语调的话语功能为例,来观察话语交际过程中的协商性特征。英语语调具有调型与句型灵活匹配的特性,语音学家韦尔斯(J. C. Wells)甚至说“对英语而言,几乎任何一种语调模式都是可能的”。^⑨英语中,每个调型与不同的句型配合,或在同一个句型上使用不同的语调模式,均会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正常的由句法和词汇所表达的语义,从而传递言外之意。正是基于句型与调型间的可选择性,说话人可依据讲话时的瞬间感觉进行选择,这时语

① P. Eckert and S. McConnell-Ginet, *Languag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6.

② 参见 J.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92, 55-56.

③ 参见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p. 1.

④ 参见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杨信彰导读部分,第 F12、F11 页。

⑤ B. Paltridge, *Discourse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8, p. 24.

⑥ 参见 C. A. McLemore, *The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Intonation: Sorority Speech*,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91.

⑦ Paltridge, *Discourse Analysis*, p. 53.

⑧ 参见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118.

⑨ J. C. Wells, *English Intonation: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调不仅达成语法意义上的句子，更显示了说话人对所讲内容的态度和对语境（即“情景即时语境”）的认知。而听者在交际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对方说了什么，而是言说的方式”，^①为此交际双方需要在动态语境中不断地进行协商性话语模式选择。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语言的协商性显示了语言使用包括语境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这一根本特征”，^②也进一步佐证了话语意义是在交际互动过程中动态产生的观点。因此，要想使会话交际成功，说话人与听话人应能共享相互间的话语意义，而这需要会话双方了解和掌握语言使用的各项内部和外部规约。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区分相对稳定的语法规则，且语法与话语含意相关并遵从一定的语言形式，但对话语的解读从来不是机械的仅遵循内部规则，外部语境的影响无法回避。

（四）话语交际与适应性

语言使用具有较广泛的可选择性、语用原则的高度灵活性等特性，但人们的日常交际活动似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维索尔伦将此归功于语言使用的适应性特征。语言的适应性能让人们从一组范围不定的可能性里，在交际互动过程中协商性地进行话语选择，以此方式趋于满足交际的需要。这种“交际的需要”通常在语境中产生，而语境本身则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适应性特征的“趋于满足交际的需要”意味着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亦即不能由此排除交际失误甚至交际失败情况的发生。维索尔伦还特别指出，语言适应性不能被理解为是单向的，因为语言选择与语境这两者间是相互构成、彼此适应的。^③在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中，他再次强调了适应性主要是指在产出话语意义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动态的、协商性的相互适应。^④托马斯（J. Thomas）同样指出：“话语含义的形成是一动态过程，涉及说话人与听者间的协商，这其中包括语句的语境（包括有形的、社会的及语言学等层面）和隐含的语义。”^⑤

可变性和协商性从理论上更透彻地解释了在开展话语分析时，需要参照话语产出时的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语境，除了字面本身的意思外还需要考虑语言使用的互动协商和适应过程对话语的真实意义的影响。就外语学习而言，了解和掌握目的语在话语选择上的适应性，能帮助外语学习者提升自己表达或解码母语说话人真实话语含意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语言选择具有灵活性，但仍会遵循普遍适用的语用规则。比如：（1）I'm reasonably satisfied.（我相当满意。）（2）I am not dissatisfied.（我不是不满意。）在这两个例句中，（2）使用了双重否定，其语义意味着肯定，但相较于（1），按照肯定-否定程度的等级划分，（2）仍偏向于否定级（事实上汉译的句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维索尔伦的语用学综观理论在论述其宏观语用的观点的同时，通过语用综观的适应性概念，从四个研究视角（任务）将语言的使用和选择研究导入微观语用分析的理论框架中，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话语分析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解释工具。适应性的四个研究视角具体而言主要包括：1. 适应性的语境相关成分，主要是观察交际语境如何影响话语模式的选择。交际语境既包括实际的物理环境，也涉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以及会话双方的思维模式。因此，语境要素成分首先是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即说话人和听者；在此基础上，维索尔伦把语境相关成分由内而外概括为：“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⑥ 2. 适应过程发生在语言结构中的具体层面。由于选择可以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一层面上，因而语用现象可以被关联到语言结构的任一层面来加以考察，亦即“所谓适应层次就是适应过程施行的任何一个语言结构层次。所谓适应特征就是任何一个语言结构层上的任何一个语言特征，该特征可以和任何适应对象相互适应或者可以接受任何适应过程的影响”。^⑦如果观察英语等属于

① P. Tench, *The Intonation System of English*, London: Cassel, 1996, p. 20.

②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1.

③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2.

④ 参见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52.

⑤ Jenny Thomas,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First published 1995),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2.

⑥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76.

⑦ 耶夫·维索尔伦：《语用学诠释》，第63页。

语调语言的话语交际活动的适应过程,我们会发现语调层面的语用功能会较语篇、句法和词法等语言层面更为凸显,即语调携带更多的隐含意思供说话人编码及听者去辨别解码。3. 适应性的动态过程,即考察语言适应的历时发展进程。语言适应的不同阶段以及适应特征产生作用的时点,是语用学描述和解释语用现象的基本原则。4. 适应过程中意识突显度的差异。一方面,人们无论是在言说还是听讲时对话语的编码或解码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和具有目的性的;另一方面,与语言使用相联系的社会规约通过认知处理对言语行为产生影响,即社会文化语境对话语交际活动有明显的影晌作用。

维索尔伦将上述四点概括为:“语言学的语用学主要是去理解在不同意识突显层级,并作用于语境—结构关系上作为动态过程的语言表意功能。”^①他还进一步指出:“语境与结构是(话语)分析过程的中心,我们应始终关注话语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因其反映了人类如何通过含义丰富的形式功能来表达思想的机制。”^②这也是话语分析希望达成的目标,而在具体的话语分析过程中则应重视语境的动态生成特质。

二、话语分析的微观语用工具

维索尔伦在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中运用语用学理论进行话语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步骤,为话语分析的语用学模式提供了系统化分析范本,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跨学科的有关语言使用、以语言语用学综合理论为方法论的整体解决方案。^③在这部著作中,维索尔伦提出的话语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步骤,仍根植于其语用学综观的语言使用三特性基础之上。本文以下将尝试运用适应性的四个相互关联、统一连贯且同等重要的研究视角,以交际话语为例,微观考察、分析和解释语言各层面的使用选择与适应特征,包括外部语境影响;话语内部在固有含义、风格特性等方面的适应性;话语的内在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适应过程;会话交际双方在适应过程中所表露的意识突显程度、所映射的交际参与人的心理状态(自返意识)等。

(一) 交际话语的语境适应

维索尔伦在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中指出,以语用学综观视角来看,语境是关于话语活动系列成分的一个术语,涵盖社会-历史现象、精神层面和语言上下文(包括直接文本与互文)等内容,可以归为三类不同的情景或范围。第一类是“宽泛语境”(wider context),包括诸如社会、政治、历史以及地理等等,强调在开展话语分析时需要考察具体话语与语境的相关性。^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宏观语境对话语模式的影响,即说话人会根据话语交际时的外部环境、听者的具体情况等社会文化语境来选择其认为恰当的话语模式,这一类的话语被维索尔伦称为“绘制出其所认知的‘世界’”。^⑤举例来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位女性首相后,为了让英国民众接受女性担任首相这一事实,她除了以果断的行事风格赢得“铁娘子”的尊称外,还努力改变自己话语模式,如通过降低音高、压缩音域、放慢说话速度等方式改变其作为女性所特有的尖细声音,在话语的语调模式选择上更多地使用具有权威感的降调。^⑥显然,这类话语模式选择的动机,可以用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适应来解释。

第二类语境便是前文提到的“情景即时语境”(immediate context of situation)。^⑦在这一语境下,话语分析主要关注话语交际中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受会话时的即时情景的影响状况。举例来说,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演说时,为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和增强演讲的效果,会针对不同的言语共同体听众在标

①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9.

②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52.

③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51.

④ 参见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58. 有关话语分析的语境相关性,书中的 Procedure 2. 1 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⑤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66.

⑥ R. Wardhaugh,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3rd ed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 311.

⑦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中的 Procedure 2. 2 对这一类语境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准美国英语与地区方言，或针对不同的族群在语音和文体等层面进行语码切换。^①显然，情景即时语境对会话双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话语模式选择的动态适应过程。而话语双方要形成会话的语境适应与默契，需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或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否则便容易产生交际失误或是第三方听话人无法解码对话人之间的语码。例如在一档以英国家庭妇女为主要受众的电视八卦节目中，节目主持人与现场记者间就有有关戴安娜王妃的一些传闻开启如下对话：^②

主持人：威尔士王妃昨晚在电视上承认她与前卫士詹姆斯·休伊特有染。最新的进展如何呢？马丁·弗里塞尔（现场记者）正在她常去的西伦敦的健身房外候着。马丁，她今天早上没有出现，是吧？

现场记者：嗯，现在还没有。虽然她明天要出访阿根廷，但依据她一贯的做法，我们认为她会来健身馆的。你看，不只我们一家（记者）候在这里，还有殿下专属媒体的人呢。

主持人以“威尔士王妃”这一称谓来谈论有关戴安娜王妃的绯闻，并没有直呼其名，显然是带有一定的尊敬意味，同时也隐含这一有关王妃的新闻是非常有趣的皇家新闻，以此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的兴趣和注意力。现场记者也非常默契地用“她”来回应，也没有说出戴安娜王妃的名字，显示了非常典型的动态情景语境适应过程。但对于不了解英国皇家文化的观众，可能会因为无法解码主持人与现场记者间的语码，难以形成对会话的情景即时语境适应，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在分析对话这样的动态话语时需要留意话语建构的动态特性——话语含义会随着对话的情景即时语境而不断变化，动态生成话语的隐含语义，这就需要我们用交互式的动态话语适应过程来加以甄别并做出合理解释。

（二）交际话语的语言各层面适应

在会话交际互动过程中，说话人会利用语言各层面的内在功能来体现其话语风格，并运用话语的隐含意义这一语用功能来传递言外之意。此即维索尔伦所提出的第三类语境——“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语言语境这一概念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旦形成话语，该话语便成为构成其语境的一部分”。^③语言或文本这一维度对生成语境十分重要，在开展具体的话语分析时，我们需要明确话语所利用或涉及的语言渠道（linguistic channel），话语与所形成的语境间的相互连结方式等关系。例如，说话人在正式场合会尽量选用较为正式的话语模式（体现在文字、句法及语调选择上），这一话语模式在适应语境的同时也使得交际会话语境更趋于正式；而在非正式的社交场合，则会选择使用更为随意并带有更多感情色彩的话语模式（同样通过文字、句法及语调选择来实现）。

语言层面适应会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句法、超音段以及副语言特征等。因此，要梳理话语意义的动态生成机制，我们需要关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在话语意义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以发生在语言结构词汇层面的话语适应为例来说，在描述发生在街头的抗议活动时，如果媒体报道选择使用诸如“示威”“抗议活动”等词汇，便是在表达一种中性或偏向赞同、支持的态度；而如果选择的是“骚乱”“闹事”之类的词汇，则表达了一种反对和不认同的态度。可见，词汇选择的不同，所形成的话语含义也会不同。所以无论是母语习得还是外语学习，除了语言运用能力的养成外，对语言所属社会文化应有较高的敏感度，要深刻洞察上述三类语境的细微差异和适应原则。此外，要避免因对语言的某一层面使用选择不当而产生交际失误，说话人（特别是外语学习者）需了解和掌握目的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及各层面的语用功能特性，以此强化在各层面语言使用的适应性能力。透过语用综观的适应理论，我们在开展话语分析时便能更确切地理解和解释话语模式选择的内在原因，也能更好地分析不同言语共同体的话语特征。

① 相关例子参见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229 – 233.

② A. Tolson, *Media Talk: Spoken Discourse on TV and Radio*,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6, p. 65.

③ Verschueren,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 106. 书中的 Procedure 2.3 中对这一类语境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三) 交际话语适应的动态性特征

言语交际中话语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是话语分析研究的中心内容,这是基于“语言使用的(相互)适应过程或语言的表意功能的中心要素是意义的动态生成”。^①话语意义的动态生成源自语境的动态性,即交际双方对话语模式的选择既与情景即时语境有关,也与其社会关系和认知心理状态(宽泛语境)相关。例如,语调交际功能可以让说话人动态地选择语调模式,从而不仅动态地生成语境,而且还动态地透过语调来表达话语的真实含意,同时也表明言语行为的类型,如询问或陈述、命令或请求等等。具体来说,当对话中的问话人了解到对方明天有一个活动计划但具体内容不清楚,其语调的调核重音用降调:(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明天你打算做什么?下划线音节为调核,下同)如果完全不了解对方明天会做什么,则其调核重音用升调:(4)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tomorrow? (明天你要做什么呢?)例句中,调型的使用及调核重音位置的选择更多地由谈话过程中说话人对信息掌握的程度及希望凸显的内容来动态决定,说话人可以根据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动态地利用标记语调的方式,直截了当或间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徐盛桓在讨论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会导致疑问功能消减时指出:“用疑问句表达陈述性含义和指引性的暗示,是建筑在对疑问内容的完全肯定/否定的基础上的。发问人对疑问内容的肯定/否定倾向,根本来说同他对疑问项存疑程度有关。对存疑程度考察是一个动态过程,是语境同发问人知识状态对照的过程,不反映在问句的字面上。”^②显然,这类嬗变可以利用语调与句型的选择来实现。如:(5) Is that the right way to do it? (那样做对吗?用升调)句中调核重音用升调除了正常的询问外,还显露出提问者存有疑问且有自己的答案,这是委婉地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如果(5)采用降调,则是实际地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犹如:(6) I think that is the wrong way to do it. (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但(6)陈述句用降调的表达过于直接,而(5)疑问句用降调的呈现,则是以委婉的方式暗含了否定的意思。

上述例子中,说话人都是利用语调来动态生成外显或内隐意义,并由此达成其交际目的。这也表明,无论是交际话语的语调功能研究,还是微观语用学的话语模式选择研究,语调的动态适应性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话语分析解释工具。

(四) 交际话语适应过程意识突显度

适应过程中意识突显性蕴涵认知与社会文化规约相互作用而生成话语意义这一过程,维索尔伦称之为人的“社会心智”(mind in society)状态。适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指语言使用过程中使用者对自己所做选择的自返性意识(reflexive awareness)——在认知层面关注自身语言选择和使用方式的自我意识或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③自返性意识使得话语交际过程中的适应性成为可能,并且从其语言体现看,这种意识的运作在不同个体的语言选择及适应过程中存在程度的差异。在维索尔伦看来,这一意识突显性的程度差异代表了个体的社会心智,即言语活动的适应过程映射的是话语参与者由社会与心智这两个维度所决定的认知处理过程。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似可以认为对社会文化规约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意识突显度,进而影响人们的语言选择并以话语产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正是话语分析所需要的、用于观察解释话语意义的理论工具。

仍以英语语调为例,由于英语语调提供了丰富的语境化提示资源,如利用调核重音及其在话语中的位置来凸显说话人希望传递的关键信息或是引导听话人聚焦话语的重点内容,在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有很强意识的话语行为。如在对话中:A: How does your family know so much about medicine? (你的家人怎么对医药知道那么多?) B: My father is a doctor. (我父亲是医生。降调)显然,B的回答不仅突出和强调了其父亲是医生这一信息,也暗含了其前面有关医药的话语的可信度——利用降调隐含

①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147.

② 徐盛桓:《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34页。

③ 参见 Verschueren 在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的 6.1 节对社会心智的讨论; 6.4 节对元语用意识的讨论。钱冠连、霍永寿汉译版中将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译为“工具性语用意识”。

的权威性功能。通常，以英语为母语的说话人在话语活动中会有意识并熟练地运用语调话语功能，而非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语调层级的意识突显度会比母语说话人低，这主要表现为他们时常发生语调使用不当而又无法自知的情形，亦即在语言选择上缺乏明确的自返性意识。举例来说，当英国机场餐厅服务生询问顾客是否需要加肉汁（gravy）时，土生土长的英国服务生通常会用升调，而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移民服务生则由于受母语语调习惯的迁移影响会用降调。^①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听者而言，询问时用降调是一种敷衍、不礼貌和不友好的言语行为。这生动地显示了母语和非母语说话人在语调层面的意识突显程度差异的状况，也表明在话语活动过程中话语交际的效果既需要良好的语言能力，更需要对语言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及其规约有较深刻的认知，以便建立起元语用意识，这对于外语学习者尤为重要。

当然，元语用意识的建立仍有其具体复杂性，与说话人所属的言语共同体或社群有较高的关联。以英语语调与句型的选择使用为例，升调类语调中的高升调（high rise）用于问句时通常被认为是较为随意和非正式的，低升调（low-rise tone）和降升调（fall-rise tone）则被认为是更为正式的语调类型。由于美国英语更多地使用高升调而英国英语更多地使用低升调或降升调，于是在某种语境下，英国人感到美国人说话听起来较随意，而美国人认为英国人说话听起来较正式。^②虽然同以英语为母语，但英美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对语调功能的认知和使用习惯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恰好又印证了语言选择的适应过程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而这是产生意识突显度差异的根源。因此，维索尔伦特别强调，并非所有的自返性意识都具有同样的突显性和可及性。一方面自返性意识并不意味着很强的有意识的选择或突显性；另一方面，有意程度很高的选择也不意味着就是元语用意识的一个重要形式。^③

上述语调使用习惯差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意识突显性差异，进而对话语交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误解起到预防作用。适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概念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由认知和文化差异所引发的对话语义解码的差异，从而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关注话语模式所投射的、由意识突显度确定的语境化动态选择和适应过程。

三、结 语

话语分析作为跨学科的语言使用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似乎仍处在“海纳百川”的阶段，除了认知科学理论外，它还集合了包括普通社会学理论、宏观及微观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话语研究和语言学等各学科理论。^④在话语分析是否应该拥有其专属理论这一认知上，学者们迄今未能达成共识。从正向积极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话语分析的理论建构拥有兼容并蓄的优势，但各种理论交织所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话语分析缺乏统一连贯的理论体系。本文以维索尔伦语用学综观为理论基础，尝试以适应性的四个视角对以英语语调为主的样本做话语分析讨论。语调作为语言构成要素之一，在以口语为主的言语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语境化提示功能，可以为话语分析和解释提供多样化的解码线索。维索尔伦指出，“在任一会话或会话型叙事中，语调都是解释话语意义的主要线索”。^⑤考虑到语调话语功能在不同语言间有较多的普遍性，^⑥本文在话语分析中选择以语调层面的适应性做例证，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相当的说服力。运用语用学综观论探讨在不同语境下语调如何参与话语的编码或解码，从而动态地生成意义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话语的分析和解构更为精准，限于篇

① J. Gumperz,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73.

② 参见 A. Cruttenden, *Intonation (2nd Edn.)*,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p. 51.

③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188.

④ G. Weiss and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7, p. 6.

⑤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121.

⑥ 不同语言间在语调与韵律等超音段的语音实现上有较大差异，但在语调的话语功能方面则有诸多的相似性，如不同语言大多以降调表示陈述性话语，以升调表示疑问性话语。

幅,本文仅探讨了语调与语境在话语层面的适应问题,对语言结构的其他层面的探讨当是进一步开展话语分析的任务所在。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活动,观察、理解和解释人们的日常社会化行为,是欧陆人文科学众多学者长期提倡并践行的科学研究路径,也是诸如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等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除了要理解人们如何透过话语进行社交活动这些文化现象外,我们更需要将这些理解上升为一种理论并透过这一理论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和重构人类的话语交际活动。无论是话语分析还是语用学,其任务显然都是去理解和解释人类在话语交际活动、甚或在所有的语言使用过程中,话语参与人的主客观动机和话语交际双方有意或无意地根据会话语境而采取的相互适应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言语含意、情感表达和宣泄等等。然而以人文科学的研究视角又似乎无法形成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话语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因为解释话语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支撑其解释的学科理论也非唯一,即使是对同一个话语样本,分析的视角不同,其解释的方式、所获得的结论可能也会相差甚远。但“任何一种理论均是为某一研究目的服务”,^①如此则关注作为研究工具的理论是否能对现实生活中的话语样本做出可信分析,远比是否拥有一个属于话语分析的专属理论更为重要。本文的尝试表明,如果能全方位地运用适应性的四个研究视角于话语分析中,则我们可以经由语用学综观的研究路径达至话语活动的微观分析解释层面,对话语样本做出可信的分析解释。由此,或能形成话语分析的统一连贯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解释工具。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Jiang Hongliu

Abstract: Discourse analysis takes utterance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and focuses on the thread of language used in the situation network to explore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utterances. Jef Verschueren proposes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use as a general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 phenomena in relation to the notions of variability, negoti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ragmatics have overlapping research fields in looking at patterns of language across texts and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use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When we combine these two ways of research together, we will have wider insight. Verschueren's theory with its three notions enables us to reach the level of micro-analysis of discourse activities and make an effective and credibl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samples. Thus,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as well as a suitable analytical and explanatory tool for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use, communicative context

(责任编辑:庞 礴)

^① Weiss and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2.